

江西考古出土梅福相关的宋元时期买地券

周兴¹

(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江西宋元墓葬中出土有一类较为特别、数量偏少的买地券,基本发现于吉安市境内。以张重四地券为代表,券文中将西汉梅福作为知见人,文句有固定范式,券末附咒语、符策,体现了较高的文化水平。结合《道藏》等文献,对券文中一些术语进行了简要解读,并提出吉安市为这种买地券及其背后风水流派的中心传播区域。元代以后梅福因神职降低不再作为知见人出现,但券文末符咒有所保留,在一些地方仍旧继续流传。

【关键词】:梅福 买地券 宋元时期

【中图分类号】: K871.44 **【文献标识码】:** A

买地券,“又被称作地券、地券、地契、幽契等,是在铅、铁、石板或砖瓦上书写的、用于阴间的土地买卖契约”^[1]。其出现于东汉时期,魏晋、唐五代墓葬中一直不断。宋时买地券考古出土发现较多,随葬风气之盛,比唐人埋墓志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周密曾说,“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并提及《续夷坚志》中曾发现唐哀宗时“铁券刻金字者”^[2],该说法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宋代以后多用石板雕刻或题写,学者已有较多论著进行过探讨。

本文拟对一种券文中体现“梅福”的相关买地券展开研究,券文通常表述为“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梅仙真(梅子真、梅仙人)时在旁(傍)知(知见、知状)。急急如(太上)女青(诏书)律令”句式,较为少见而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梅福相关买地券

目前发现的宋元买地券文中涉及梅福的有10例,均发现于江西省,且基本在吉安市范围内。以吉安县绍熙元年(1190年)葛仲吉妻胡氏墓^[3]所出为最早,此外考古出土的还有吉安县绍熙五年(1194年)葛仲吉墓^[4]、吉州区嘉泰四年(1204年)周必大墓^[5]、南昌市进贤县绍定二年(1229年)舒氏墓^[6]、新干县绍定六年(1233年)杨氏墓^[7]、吉水县宝祐二年(1254)张重四墓^[8](图一)、峡江县景定元年(1260年)王百四墓^[9];吉安县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彭因墓^[10]、吉安县大德四年(1300年)刘灼墓^[11](图二)、永丰县延佑六年(1319年)陈氏墓^[12],前后出现和流行了129年。

这里选取张重四墓买地券为代表,以向读者展示这种格式化的文字。券额五行竖书“有宋张君重四宣义地券”,字体较大。下方正文从右至左竖书,该券文高朋^[13]、鲁西奇^[14]、刘未^[15]都曾先后释录,然对照拓片均存在零星错释之处。本文释读如下:

青乌子曰:“按《鬼律》云,葬不斩草、买地立券,谓之盗葬。”乃作券文曰:维「皇宋宝祐二年岁在甲寅十二月己巳朔越十二日庚辰,孤哀子张叔子伏为」先考重四宣义,生于绍熙庚戌九月十有八日,终于嘉熙丁酉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庚子岁「闰月朔,葬于庐陵县膏泽乡汪塘原。今卜此吉日,动土斩草,以是月十七日乙酉改葬而安」厝之。龟筮协从,州曰吉州,县曰吉水,乡曰中鹤,原曰洞源,太平山即壬亥山己丙向,为之宅」兆。谨以冥货极九九之数,币帛依五方之色,就于后土阴官鬻

作者简介:周兴(1987-),男,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道教考古、文物研究。

地一区，东止青龙，西抵」白虎。南极朱雀，北距玄武。内方勾陈，分治五土。彼疆尔界，有截其所。神禹所度，竖亥所步。丘」丞墓伯，禁切呵护。馭彼罔象，投畀咒虎。弗迷兽异，莫予敢侮。千龄亿年，永无灾苦。敢有干犯，」神弗置汝。幽堂亭长，收付地下。主者按罪，弗敢云赦。乃命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为作券文。亡」灵允执，永镇幽宅。天光下临，地德上载。藏辰合朔，神迎鬼避。涂车皂灵，是为器使。夔龙」魑魅，莫敢逢旃。妥亡佑存，罔有不祥。子子孙孙，俾焯俾昌。山灵地神，实闻此言。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梅仙真时在旁知。急急如太上女青诏书律令敕！」（符篆）」太上灵符，镇安幽宅。亡灵永吉，子孙昌炽。邪精伏藏，蛇鼠遁迹。急急如律令敕！」玉女地券神咒。」太乙金璋，灵气辉光。六丁左侍，六甲右傍。青龙拱卫，白虎趋辇。朱雀正视，玄武当堂。川原吉」水，善应凶藏。五方五杀，不得飞扬。今奉太上玉女神祕券咒。急急如律令敕！」



图一//张重四墓买地券

经笔者对前述 10 例券文进行对比分析，葛仲吉妻胡氏、葛仲吉、周必大、张重四、王百四、彭因、刘灼、陈氏等券句式虽略有差异，但有前后相承关系，可归为一类；舒氏、杨氏墓券各自分别为一类，属于第一类的简化删减版。为便于对比，略参张传玺对买地券广例的设计^[16]。

尚可注意者，还有一方南昌市进贤县绍定五年（1232 年）曾氏太君地券^[17]。该券与此类买地券体例极似，如业主“后土富媪”、合券者“翰林主人、子墨客卿”，而且同样有“青乌子……盗葬”。然无知见人，而改为“寻山定穴：李淳风先生、郭璞仙人、白鹤仙人、张坚固、李定度。”则显然不能列入与梅福相关之列，故本文未收入。



图二//刘灼墓买地券

二、梅福事迹

梅福为西汉末年成帝、平帝时人，事迹见于《汉书》^[18]和《资治通鉴》^[19]等正史中。表字子真，九江寿春人，曾任南昌尉，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专权，梅福曾多次上书。“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20]贞观十五年（641年）梅福宅已被改建为太乙观^[21]，其后“子真庐”更是被唐末五代时期的高道杜光庭列为道教“三十六靖庐”之第十一庐^[22]。

《道藏》还收有宋代仙坛观道士杨智远所撰《梅仙观记》^[23]和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24]，对梅福的事迹、成仙经历有较多的叙述，记载了因为“国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祷皆有感应”和“（梅福）数以孤远极言天下之事，其志壮哉！”等原因，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敕特封“寿春真人”、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特封“寿春吏隐真人”封号，收录有敕牒全文，可作梅福其人生平之补充材料。《梅仙观记》中的《梅仙事实》章节是目前所见唯一较为系统记述梅福修炼成仙过程的资料^[25]，可考知梅福汉代以后被神化、宋代得到朝廷敕封的过程。除此之外，如高朋已经指出的，宋人笔记小说《稽神录》《麈史》中也有提及^[26]，另《黄氏日抄》记载梅福作为“相山四仙”之一，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和端平元年（1234年）两次再封^[27]，惜未载所封仙号。然而在《道法会元》中将梅福作为马灵官的“提魂倒降使者”或“迷魂倒降将军”^[28]，此外还有“腾魂倒降使者”“腾魂摄附大将”等不同称呼，多为施符咒时召使，神职地位已然降低。

梅福的传说还出现于江西、福建、湖南和安徽、江苏等省方志中^[29]，浙江省绍兴^[30]、宁波^[31]和舟山^[32]等地也都有梅福传说，

杭州临安甚至尊其为所谓“茶祖”^[33]，可知梅福信仰在南方地区传播范围之广。

三、相关研究

（一）知见人梅福的出现

上引涉及梅福的买地券，属宋代者年代最早为宋光宗绍熙元年，最晚为宋理宗景定元年，距离朝廷两次敕封真人已经过去一百余年。按照常理，皇帝敕封对于民间神祇的信众崇拜和影响力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目前出土的买地券中并未发现两次敕封后就出现以梅福作为知见人的例子。如北宋元丰五年第一次敕封后，九江元丰八年（1085年）蔡八郎墓买地券作“知见人同亡人酒脯百味香食……仙人书契此石道士充保”^[34]、新余元祐元年（1086年）胡三郎券作“知见人直符”^[35]；南宋绍兴二年第二次敕封后，所见瑞昌绍兴三年（1133年）刘三十八郎券作“原知见人岁月主者”^[36]、吉安绍兴十一年（1141年）刘三解元券中“见人李定度”^[37]，依然为唐五代、甚至东汉以来习用惯例，似乎朝廷敕封和民间买地券以梅福作知见人这两者之间缺少必然的联系。

李俊清在对《梅仙观记》进行研究后，提出《梅仙观记》编定于南宋末年，而杨智远活动于北宋元丰年间，故该书作者并非杨智远；且根据书中所记，推算《梅仙事实》撰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或至少是在淳熙以后^[38]。而邱园莉认为“《梅仙观记》始修于北宋，主体部分完成于南宋绍兴，元代续添，明代人亦有更改”^[39]。

巧合的是，笔者发现如果依李俊清的观点，将《梅仙事实》的撰写年代推定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以后，则恰好与目前江西地区考古出土买地券中出现梅福这一情况产生先后关系。这或许可以认为《梅仙事实》的撰成，是梅福崇拜达到顶峰的表现，继而同时在民间买地券中得到反映，相应地解释了为何朝廷敕封达一百多年后民间葬具中才有所回应。另一方面，根据这一时间出土地券文书突然出现以梅福作为知见人，反证了《梅仙事实》可能确实撰成于淳熙后。

至于为何以梅福充当知见人，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考虑到他的官方身份，“要采用那些在国家祀典中的神灵来充当见证人，以确保契约得以合法以及有效的执行”^[40]。本文认为还与梅福在本地域内的信仰知名度、祈祷灵验度等因素有关，即便目前尚未发现宋代时梅福的执掌范围与冥界阴间有任何关联。

（二）买地券类型及使用者身份

上引涉及梅福的买地券，基本都有“青乌子曰：按《鬼律》论云，葬不（斩草）买地立券，谓之盗墓”“龟筮协从，州曰某某，县曰某某，乡曰某某，原曰某某，某山某向，为之宅兆”及“东止青龙，西抵白虎，南极朱雀，北距玄武”等语句。关于这种写法的买地券类型，黄景春^[41]和刘未^[42]的论作都已经注意到，鲁西奇^[43]更对这些买地券进行了简单介绍和完整录文，并将券文中所载神祇进行了列表，然表中有个别错误之处，周必大地券“见人”处缺“梅仙真”；王应白（即王百四）地券“保人梅仙真人”实应为“见人梅仙真”。

江西地区宋元时期买地券目前考古出土约100件左右，从数量上来对比，本文所论及的这种买地券仅占不足十分之一；结合多发现于吉安市范围内这一情况，笔者推断，产生这种买地券的风水派别当时的传播中心范围当在今吉安市，影响相对较小。笔者还发现，虽然宋朝皇帝早已敕封“寿春真人”和“寿春史隐真人”称号，但买地券中仍然称“梅仙真”或“梅仙真人”，甚至直呼其名为“梅子真”，表明朝廷封赐使梅福成为国家的正统神明，进入国家祀典，其影响力得到扩大^[44]。但显然这类民间买地券行文受官方影响较小，有自己的流传范围或风水派别，因而会流传这一类券文范本。

该类买地券文本券式与北宋王洙《重校正地理新书》和元代《莹原总录》均不同，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文本结构，自成体系。因此本文认为这种买地券虽然目前发现较少，但为便于研究，仍可将其归为单独的一种类型，而不宜无视其独特性，而笼统归

入江南样式江西淮南类型^[45]。

还有人统计，梅福宫观祠宇以江西省为最多，达28处；而江西省内又以南昌府南昌县为最多，有5处。临江府（今吉安市）总共只有4处^[46]。此数据或有缺漏，但似乎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江西作为梅福信仰的主要分布区，与本文论述的这种买地券的信仰群体无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体现在数据分析上，与梅福宫观祠宇这些留存遗迹无关。

有关买地券使用人的身份问题。根据券文或墓志铭，可以看出，墓主十人除周必大官职较大外，其余不乏富户、平民这些中下层人士。笔者认为这种形式买地券“主要出土于较大墓葬，可见只有高官或富豪之家采用”^[47]的结论略显武断，而应该是上至国公、下至平民墓均有发现，虽然数量较少。并且，周必大曾任宋高宗永思陵的山陵使，是郭璞风水葬法的积极推行者^[48]，结合下文分析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三）相关问题探讨

1. 券文中的术语

（1）“青乌子”与《鬼律》

关于“青乌子”，东汉时期墓葬出土文物中已有，如洛阳烧沟M1073出土的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解注瓶文^[49]。道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有青乌子，能相地理，（黄）帝问之以制经。”“青乌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师之教，精审仙妙之理。”^[50]詹石窗^[51]等道教研究者早有精当的看法，此处本文同意《中国道教考古》认为青乌子“为北帝佐相”“乃服食成仙而善堪舆葬术的仙人，自汉末以来即加入了道教的神仙系统”^[52]的观点。

《道藏》现在能看到的《鬼律》只保存下来了《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和《女青鬼律》两部，分属洞玄部戒律类和洞神部戒律类。券文提及的所谓“葬不斩草……谓之盗墓”两书均无记载。关于《鬼律》下文还将论及。

（2）九九之数、五方币帛

券文中“冥货极九九之数，币帛依五方之色”，所谓“九九之数”全称一般写作“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53]，表示买地的虚拟价格，东汉、南朝一些地券中已经呈现雏形。关于此点，黄景春已有专文^[54]，此处不赘。“币帛依五方之色”字面理解是按照五方五种不同颜色的币帛参与丧葬活动。然而大儒张载在《丧纪》一文中指出，“南方用青囊，犹或得之……南人试葬地，将五色帛埋于地下，经年而取观之，地美则采色不变，地气恶则色变矣”^[55]，则似乎又兼为一种择穴检验方式。

（3）“天光下临，地德上载。藏辰合朔，神迎鬼避。”

均出自晋代郭璞《葬书》。该书对“天光下临，地德上载”的解释为“天有一星，地有一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葬得其所，则天星垂光而下照，地德柔顺而上载也！”^[56]“盖穴有三吉，葬直六凶。……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57]，“藏辰”原书作“藏神”，后一句意谓埋葬选择良辰吉日，则吉神会迎接、凶煞会逃避。宋代买地券中已将两句连写，清代时亦如此，如“郭景纯曰：‘天光下临，地德上载。藏神合朔，神迎鬼避。’”^[58]

（4）“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等

高朋已经指出，“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和“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分别源自《汉书》和《诗经》^[59]，此外笔者搜检儒家经籍，如“有截其所”（《诗经》）、“龟筮协从”（《尚书》）和“涂车刍灵”（《礼记》）等，确实反映了“宋元时期江西买地

券显示出很高的文化水平，券文写作中有一种创新精神。”^[60]结合上面几点，本文认为这一类买地券的创制者应该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熟悉《诗》《书》等儒家经典、并能将风水术语和道教符咒融合其中的道士或民间风水师。

2. 女青律令、太上女青诏书律令

同青乌子一样，女青也为道教神祇，“既是道教大神的使者，又掌管玄都中宫鬼律，具有强大的镇服万鬼的威力”^[61]。本文所论地券“时在旁知”文后，较早的胡氏、葛仲吉两券仅称“急急如女青律令”，剩下的一般都作“急急如太上女青诏书律令”或不提，可能是文本、称谓演变所导致，指示意思相同。

《中国道教考古》一书对女青鬼律^[62]和女青诏书律令^[63]已经进行过诠释，可参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女青诏书律令》应该就是指的《女青鬼律》^[64]，成书时间丁培仁认为在东晋中期^[65]；白彬等进一步推定约在距永和八年（352年）不远的东晋中期，属于“寇谦之新天师道以外的天师道文献”，且因其南方地域特征明显，更将这些带有“女青诏书律令”的买地券认定为南天师道遗存^[66]。再者，有人指出北宋中期后道教新创经典已不再提及女青，但在宋《地理新书》、元《荃原总录》和明《三元总录》中仍以“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结尾^[67]，笔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民间买地券文本范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

3. 地券神咒与神秘券咒

(1) 上文所列有 8 方买地券中都有“太上灵符，镇安幽宅。亡灵永吉，子孙昌炽。邪精伏藏，蛇鼠遁迹”类似内容，杨氏墓券文中为“右一灵符，永镇幽宅。亡魂安静，子孙逢吉。魑魅藏踪，蛇口徙迹”，个别文句不尽相同，与其他墓所出略有区别。据张重四券文指示，可知为“玉女地券神咒”。



图三//周贵高墓买地券

(2) 在张重四、彭因两墓券文中还有两段神咒，即“太上玉女神祕（秘）券咒”，咒语为“太乙金璋，灵气辉光。六丁左侍，六甲右傍。青龙拱卫，白虎趋辔。朱雀正视，玄武当堂。川原吉水，善应凶藏。五方五杀（煞），不得飞扬。”

宋元以后，明代江西本地买地券文后转为另一种咒语，以南昌正统十一年（1446年）余妙果墓买地券为例，券文作“元始符命，告下十方。部卫形魂，安镇玄堂。五方五煞，不得飞扬。子子孙孙，永世吉昌”^[68]，或见于吉安市泰和县出土的几方买地券，为“元始符命，普告十方。部卫形魂，安镇玄堂。水土旺聚，精邪伏（遁）藏。五方五炁，不得飞扬。如（尔）子若孙，世世其昌”^[69]（图三）。总体四句五句不等，后亦画符篆。此种地券以嘉靖朝居多，晚到16世纪末的万历中期，也基本在吉安市范围内发现。

江西省外，安徽合肥明正统九年（1444年）陶时墓所出“阴契券文”背面亦有类似文字，为“太乙金章，神气辉光。六丁左侍，六甲右傍。青龙拱卫，白虎趋辔。朱雀正视，玄武当堂。蛇鼠遁迹，邪精伏藏。亡魂安妥，子孙吉昌。五方五土，不得飞扬。川源吉水，永镇山岗。（符篆）”（图四）^[70]以张重四券作参照标准的话，也应该是道书未见的所谓“太上玉女神祕（秘）券咒”。句式变动，则可以解释为后世传抄过程中产生混淆，将两种不同咒语合而为一，且传播范围扩大，已经从江西流传到安徽。

近来李明晓引述他人结论，以嘉靖九年（1530年）周贵高券、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氏券、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王孺人诸券文为例，提出江西明代买地券仍体现出鲜明的梅福信仰^[71]。但笔者仔细搜检，均已不列梅福，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元代以后，梅福不再出现于买地券中。这或许与梅福信仰的衰落有关，证据之一即上文所引《道法会元》中所记载的梅福神职，已经从南宋时“寿春吏隐真人”降为马灵官的使者或将军，在道教神仙信仰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加之明朝推崇玄武大帝等神祇。因此，在明代买地券中未再出现梅仙真作为知见人的实例，但咒语仍有少量流传。

还需要指出的是，上引泰和县明代买地券，即便多方券文最后有“正一盟威秘篆混元一气法师……承诰奉行”“灵宝洞玄仙卿……承诰奉行”等句，明显属正一派、灵宝派无疑。但咒语较宋元时改动为多，尚不能据此上推张重四、彭因墓地券的道教派别。



图四//陶时墓买地券（背面）

结语

江西地区宋元时期出现以梅福作为知见人的买地券，是梅福信仰在本地达到高潮，反映在民间随葬文书中的一个表现，虽然数量较少，但使用者从高官到平民都有发现。据券文内容分析，其文句优美，文本创制者应为文化水平较高的道士或民间风水师。券文后附的两段咒语，在梅福消失于地券券文后，依旧流传到明朝，且传播到安徽境内。随着今后考古出土资料的增多，有关其类型分类、研究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 [1]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 [2]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277页。
- [3]高立人主编：《庐陵古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 [4]同[3]，第7页。
- [5]a.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6、567页；b. 同[3]，第9、10页。
- [6]同[5]a，第570页。
- [7]刘未：《鸡冠壶：历史考古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16页。
- [8]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年第2期。
- [9]同[5]a，第575、576页。
- [10]同[3]，第10、11页。
- [11]同[7]，第417页。
- [12]a. 陈柏泉：《江西出土地券综述》，《考古》1987年第3期；b. 同[5]a，第580页。
- [13]a. 高朋：《江西地区出土宋代买地券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1页；b. 高朋著：《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 [14]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5、406页。
- [15]同[7]，第415-418页。
- [16]张传玺：《买地券文广例》，《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174页。
- [17]同[5]a，第571、572页。
- [18]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7-2927页。

-
- [1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三册），中华书局 1956 年，第 1042、1136 页。
- [20]同[18]，第 2927 页。
- [21]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道藏》（第五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第 279 页。
- [22]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藏》（第十一册），第 57 页。
- [23]宋·杨智远：《梅仙观记》，《道藏》（第十一册），第 61-69 页。
- [24]a. 同[21]，第 184、185 页；b. 明·洪应明：《消摇墟经》，《道藏》（第三十五册），第 375 页。
- [25]李俊清：《〈梅仙观记〉考辨》，《世界宗教研究》1997 年第 4 期。
- [26]同[13]b，第 75 页。
- [27]宋·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708 册，第 950 页。
- [28]明·《道法会元》，《道藏》（第三十册），第 405、377 页。
- [29]a. 宋恩常：《寻找梅山教法主和梅山地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b. 邱园莉：《梅福信仰文献整理与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 年，第 44-110 页。
- [30]宋·陆游：《梅子真泉铭》，《陆游集》第二十二卷，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2181 页。
- [31]俞志浩：《梅福教民学染衣》，《宁波通讯》2005 年第 6 期。
- [32]元·盛熙明：《补陀洛伽山传》，武锋点校《普陀山历代山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第 6 页。
- [33]竺济法：《葛玄植茶事文献可采信——当代各地宣传的六位汉晋真假茶祖、茶神考辨》，《农业考古》2017 年第 2 期。
- [34]九江县文物管理所：《江西九江县发现两座北宋墓》，《考古》1991 年第 10 期。
- [35]同[5]a，第 553 页。
- [36]刘礼纯、周春香：《江西瑞昌发现南宋纪年墓》，《考古》1991 年第 1 期。
- [37]同[3]，第 119 页。
- [38]同[25]。
- [39]同[29]b，第 9 页。

-
- [40]同[13]b, 第 75 页。
- [41]同[1], 第 489、490 页。
- [42]同[7], 第 418 页。
- [43]同[14], 第 385-418、504-508 页。
- [44]同[29]b, 第 166 页。
- [45]同[14], 第 496-508 页。
- [46]同[29]b, 第 193、194 页。
- [47]同[1], 第 490 页。
- [48]余格格:《郭璞〈葬书〉伪书考》,《浙江学刊》2016 年第 5 期。
- [49]张勋燎、白彬:《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册),线装书局 2006 年,第 158 页。
- [50]同[21], 第 108、140 页。
- [51]詹石窗:《青鸟、道教与生殖崇拜论》,《民间文化论坛》1994 年第 2 期。
- [52]张勋燎、白彬:《中原和西北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解注文研究》,《中国道教考古》(第二册),第 510 页。
- [53]陈定荣:《江西金溪宋孙大郎墓》,《文物》1990 年第 9 期。
- [54]a. 黄景春:《作为买地券地价的“九九之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 年第 3 期; b. 同[1], 第 168-179 页。
- [55]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第 299 页。
- [56]晋·郭璞:《葬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08 册,第 26 页。
- [57]同[56], 第 35 页。
- [58]清·允禄:《钦定协纪辨方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11 册,第 884 页。
- [59]同[13]a, 第 14、15 页。
- [60]同[1], 第 492 页。
- [61]a. 黄景春:《早期道教神仙女青考》,《中国道教》2003 年第 2 期; b. 同[1], 第 232 页。

[62]张勋燎、白彬：《吴晋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中国道教考古》（第三册），第 985-992 页。

[63]同[62]，第 911-915 页。

[64]a. 白彬、代丽娟：《试从考古材料看〈女青鬼律〉的成书年代和流行地域》，《宗教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b. 刘莉：《道教“鬼律”初探》，《宗教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65]丁培仁：《道教戒律书考要》，《宗教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66]同[64]a，第 6-17 页。

[67]同[1]，第 235、236 页。

[68]同[5]a，第 584、585 页。

[69]萧用桁：《江西泰和明朝“买地券”考略》，《南方文物》2017 年第 1 期。

[70]汪炜、赵生泉、史瑞英：《安徽合肥出土的买地券述略》，《文物春秋》2005 年第 3 期。

[71]李明晓：《新见魏晋至元买地券整理与研究》，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68 页。